

专题

◀ (上接15版)

虚,成为良吏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如何确定这些史料的真实性?从常识而言,这种程式化的记述难以尽信,但由于汉唐史料的匮乏,我们在史传中很难发现其中有虚饰和作伪的直接史证,而在史料较为丰富和完整的宋代却保存有大量相关记述。《宋会要辑稿》中专门有《狱空》一节,辑录了宋代大量的“狱空”史料。宋制:凡各地上奏狱空,君王均下诏褒奖,并相应减少官吏磨勘年限,各级官吏为获得升迁的便利,往往铤而走险,制造“狱空”假象,或将系囚秘密处死,或藏匿他处,或“部内系囚满狱,长吏辄辄隐落,妄言狱空”,或“自勤发遣致狱空”。宋代与汉魏南北朝时期相去数百年,时代不同,典制有别,但人同此情,事同此理,宋代“狱空”之制的实施过程为我们观察汉唐地方行政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某些旁证,使我们有理由对汉唐良吏传中“囹圄空虚”记载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在中古史研究中,能否引入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与视角,使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史料相互佐证,探寻更为宏观的历史线索?罗新教授近年发表的《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2014年)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观察视野。他注意到,《北史》记述北魏孝武帝即位仪式:“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高)欢居其一。帝于

毡上西向拜天讫,自东阳、云龙门入。”这与《旧唐书》所载突厥可汗即位仪式、《辽史》所载契丹可汗即位仪式惊人地相似,而蒙古成吉思汗也是由七个人用黑毡抬上大汗宝座的,其中举毡人数和毡子颜色,竟与《北史》所记魏孝武帝的即位仪完全一样。作者由此推测:这种被拥戴者以毡托负起来登上首领职位的即位仪式是内亚游牧政治体的古老传统。“尽管拓跋鲜卑以前及同时的资料已不可见,但之后上千年间的证据不仅足以证明拓跋的‘代都旧制’的确存在并且曾为北魏长期遵用,而且也说明了内亚传统的独立性和连续性,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历史中的内亚因素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窗口。”“无论资料如何不全面、不充分,无论解释如何不足以令人惬意,从现有的研究可以看到,举毡立汗无疑是内亚草原古老且富有强韧生命力的政治文化传统。已有的证据显示,拓跋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和蒙古都沉浸在这一传统之中。而且还可以推测,与拓跋同时的柔然,与回鹘同时的黠戛斯,与契丹同时的奚,以及许许多多其他曾经结成较大政治团体的所谓部族,都不太可能置身这一传统之外。”——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文字的史料在内亚乃至全球史的视野下融会贯通,无疑是一次新奇而大胆的尝试,引人入胜,令人掩卷长思。

当然,扩大中古史研究的史料视野不等于无节制地使用旁证,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基于直接史料证据和旁证史料同史实之间客观联系的不同性质和程度,它们对史实的证明效力有所不同,我们对所谓“旁证”史料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在研究中应尽力克服主观因素的干扰,避免牵强和武断。著名史学家陈垣对于无版本依据的“理校法”曾有一段精辟的评说:“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鹵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1959年)此语借用到所谓中古史研究中的“旁证法”也同样适用:旁证的引用与合理的推测是史学研究中极高明的“上乘武功”,“走火入魔”的风险也较寻常历史阐释成倍增加,研究者既可以通过天才的假说使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线索豁然贯通,也可能因为一条史料失察或误读而满盘皆错,既“高妙”又“危险”。研究者需要具备广博的史才、敏锐的史识和谨慎的史德,推测越是大胆新颖,文章越是引人入胜,史家越是要反躬自省,戒惕于心,时时留意,如履薄冰,避免落入小说家言的陷阱。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冯其庸题《瑞禽车马图》,东汉,萧县虎山散存

◀ (上接15版)

也作过《西省考》,如今有了考古遗址的映证,相关研究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在研究萧梁台省职吏时,我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南朝尚书上省、尚书下省的方位问题,陈老师在评议时对我报告中的相关看法作了指正,他对中古官城结构的全面推考,则带给我更多启发。

以史料利用为主题的本次研讨会,交流者们的报告将一、二、三类史料都覆盖在内了。在侧重上,可以看到大家主要还是以一类为本为主,以二、三类为辅,用后者去补充前者。这是最传统也最“正派”的路径。研究的议题,邓、陆二位着眼于政治,陈鹏博士《东晋南朝的“十八州谱”与郡郡著姓》着眼于士族,拙文《萧梁“三品蕴位”考论》着眼于职官制度,传统问题占据了半边天。用传统史料做传

统问题,注定是一条难行路,但个人相信,其前景绝不黯淡。因为一旦深读正史就会发现,前人没能回答的问题其实极多,就连文献本身的整理点校都还有不少需要修正的地方,近年中华书局联合古代史、文献学学者重新点校二十四史,动因即在于此。我选择萧梁官班体系中的三品蕴位作为切入点,提出与前辈们不同的看法,也是因为发现中华本《隋书·百官志》的断句存在问题,而该问题误导了很多学者。

我是穿过历史地理学之门走进中古史地界的,起初关注重点是汉魏六朝政区,然后由政区而职官,由职官而人事,由人事而政治,从确定的“物”出发,一步步向充满不确定性的“人”靠拢。在进行过程中,深感不管政区建置,还是职官制度,均有大量悬而未决的难题散在沿途等待。拿官制史来说,中古的一类史料就那么些,二、三类史料里的信息也有限,特别是南方墓志数量远

少于北方的情况下,研究东晋南朝职官,纵然辅以出土文献,也是捉襟见肘。那将中古史料用完,是否便走投无路了呢?我不这么想。考虑到历代制度的延续性,上则秦汉、下则唐宋的官制材料,都可为我们所用。

游逸飞近来刊发的游戏文字《制造辛德勇》里,将北京大学中古史的研究趋势概括为“立足魏晋,放眼秦汉”,可以理解为内容均是归于中古,而起乎秦汉乃至先秦。官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又名《科举前史》,他起初被委派去研究清代科举与选官制度,后扩展为研究中国科举史,再进一步回溯,这才走向了中古的九品之法。此种贯通的视角,不仅可“通古今之变”,增加研究的纵深,提升我们对任一断代的理解,在考证具体问题时,前后时代的史料,也可为我们提供补益。宋代政事堂“堂后官”等吏职人员的设置、任命与升迁资料,能够协助我们构拟中古台省令

史的职业图景;南京大学宋史专家李昌宪老师近年推出的著作《宋朝官品令与合班之制复原研究》,亦能加深我们对中古官班制度的理解。又,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唐代籍账材料,或许也可为东晋南朝史上纠缠不清的黄、白籍问题,提供最终解决的思路。

只要抱有通史的观照,任何断代的史料都能为其他时代所用,而他国的史料,也可加深对本国史的认知。日本学者将贵族制社会的理论驾轻就熟地运用于中国史研究之上,对中国的中古时代有着亲切的理解,这是因为日本的近现代原即脱胎于贵族制社会,且国家各层面长期保留贵族制的残余。日本走进与走出中古时代,比中国大约晚了一千年,于是他们的中古史料得以大量保存至今。这些史料及其研究,绝对可以拿来用作理解中国中古时代的镜子。事实上,国内个别敏锐的学者,已经开始从事

这方面的工作了。

走出中古走向通代,走出中国,走向东亚、走向世界,视野有多宽广,史料就有多丰富。对中国中古史研究来说,可资利用的“云史料”可谓无穷无尽。这让我回想起中学时代的地理课本,编者用严肃的笔调诉说着对能源枯竭的担忧。按照20世纪中叶学者们的推想,在我们这代人的有生之年,石油会枯竭,煤炭也会枯竭,长此以往,工业革命带来的福利将难以为继。可事实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探索的深入,石油越采越多,预期枯竭时间不断延后。与此同时,新能源也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犯不着杞人忧天。同样,中古史研究绝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面临史料竭尽的危机,我们这些用传统方法研究传统问题的“工业派”、“农耕派”学者,只管一路向前。(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